

大家精要
DAJIA JINGYAO

方孝孺

FANG XIAORU

吴

林
◎ 著



大家精要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策划

大家精要

方孝孺

吴林◎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方孝孺/吴林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9. 12

(大家精要)

ISBN 978-7-5415-4278-7

I. ①方… II. ①吴… III. ①方孝孺(1357~1402)
—传记 IV. ①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5544 号

出 版 人: 李安泰

策 划: 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易 山

特约编辑: 秦 丹

整体设计: 向 炜 高 伟

大家精要

DAJIA JINGYAO

方孝孺

FANGXIAORU

吴林◎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云南教育出版社

云南教育出版社 发行

网站: <http://www.yneph.com>

(650034-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开本: 660×960 1/16 印张: 10 字数: 100 千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978-7-5415-4278-7

定价: 16.80 元

目 录

引子	001
第1章 方孝孺生活的时代与地域	003
一、人杰地灵的家乡	003
二、儒父济世及家庭影响	004
三、早慧而扎实的童年	006
四、勤奋自律的青少年时代	010
五、空印案祸及方家	013
六、师从开国文臣	014
七、赋闲田园，专心著作	020
八、授课汉中，兼蜀王世子师	028
九、辅佐建文，改洪武弊政	032
第2章 方孝孺与三朝帝王	036
一、遇太祖而不见用	036
二、与建文的切磋琢磨	038
三、成祖的靖难和遭十族之祸	047
四、正学之难对后代士风的影响	054



002

第3章 方孝孺的理学思想 ————— 062

- 一、心性论与道学方法 ————— 062
- 二、图《周礼》经世 ————— 065
- 三、辟佛、道异端 ————— 067
- 四、天人合一观 ————— 072
- 五、格物致知论 ————— 074

第4章 玫瑰色的政治思想 ————— 079

- 一、以民为本的君职论 ————— 080
- 二、正统变统论 ————— 086
- 三、君臣关系说 ————— 090

第5章 出入于东坡与龙川之间的文学风格与成就 ————— 094

- 一、为学 ————— 094
- 二、文学思想的形成 ————— 102
- 三、文道合、气昌辞达、因变的文学主张 ————— 103
- 四、散文理论与创作特色 ————— 118
- 五、品高气宏的诗歌 ————— 127
- 六、文学成就及其影响 ————— 135

结语 ————— 146

附

- 年谱 ————— 151
- 参考书目 ————— 154

引子

方孝孺

FANG XIAORU

001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蜀献王赐号正学，浙江台州宁海人。生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卒于明建文四年（1402）。一生先后经历了元末、明初、靖难两个皇朝三个时期，但是他一生中最辉煌、最有影响的时期仍是在明朝。方孝孺自幼随父读书，聪敏勤奋，每日读书的厚度都超过一寸，被乡人看做是韩愈再生。他以理学和才华赢得社会的承认，成为明代初期著名的理学家。21岁时，他又前往浙江金华受教于著名理学家宋濂。由于他天资极高，力复理学，数年之内就高出侪辈，得到了宋濂的褒奖。宋濂在《送方生还天台诗序》中称赞他：秉性凝重而不被外物所牵系，聪颖不凡足以洞悉万物至理，时而为文，文思亦如水流泉涌。这种卓尔不凡的人才就像在啁啾合鸣的百鸟中忽然见到了一只凤凰一般。在《祭太史公七首》中，宋濂甚至说，如果再给方孝孺一些时间以增长他的学识，自己恐怕也会有所不如了。

方孝孺本人对于文章并不看重，甚至多次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表白自己不欲以文章名世，他所渴慕的是圣贤之道，最希望做的是取法圣贤、师法圣贤。方孝孺对自己的志向有着明确的定位，他说：“其大者，将宏廓敷扬其所传于世，俾人得乐生达理；其次亦将整齐周公孔子之成法，为来今准；下此犹当著

一书，据所蕴蓄，补艺文之遗缺，续斯道于无极，岂止与诸子竟铢两毫末于文艺之籍哉？”方孝孺的思想与志向由此可见。他是以敷扬上古先贤之道为务，希望通过这种传递使人民能够幸福地生活并体悟先贤的道理，其次是收集整理，再次也是根据先贤至理著书立说来延续之。一言以蔽之，方孝孺认为文只不过是载道的工具罢了。

洪武年间，方孝孺曾两次被明太祖朱元璋召至京师。朱元璋对他也非常赏识，看了他的《灵芝甘露颂》后，不禁赞叹他：“异人也，吾不能用，留为子孙光辅太平。”明太祖去世后，惠宗按太祖遗令，将方孝孺召为翰林侍讲，其后又多次升迁，并参与机要。建文四年，燕王朱棣的叛军攻破京城，方孝孺被捕下狱。朱棣为了掩盖自己篡位的行径，命方孝孺草诏。方孝孺誓死不从，燕王以灭九族相威胁，方孝孺浑然不惧，痛骂不休，对朱棣说，即便灭十族又能如何。燕王大怒，割了他的舌头，并处以磔刑。朱棣还灭了方孝孺的九族和他的门生游党，号为“十族”。

第 1 章

方孝孺生活的时代与地域

一、人杰地灵的家乡

方孝孺出生于浙江省台州府宁海县缙城（或称缙城里）。宁海位于现在的浙江象山、奉化、新昌、天台、三门之间，有近 180 公里长的海岸线东连大海；另有天台山横贯宁海的中、西部全境，远望层峦叠翠，绵亘起伏；行走其间，随处可见飞瀑流湍，水色映带左右，景色非常优美。宁海是真正的鱼米之乡，因为当地不仅雨量丰沛、土壤肥沃，极宜于农作物的生长；而沿海居民更是因地制宜，多以捕鱼、贩鱼为生。

当地的杰出人物更是层出不穷。北宋时，有被称为“浙学先河”、“理学先声”的罗适，为官方正不阿，勤于政务，清正为本，常为民利而逆上意。宋元之际出现了著名的史学家胡三省，誓死不屈从于元朝，隐居山林。他们以高风亮节与刚直不阿的立身处世之道沦肌浃髓地沾溉着后人。前辈们留下来的精神遗产，无形无声地影响着追慕先贤古风的孝孺。

二、儒父济世及家庭影响

方孝孺的父亲名克勤，字愚庵，又字去矜。生于元泰定三年（1326），卒于明洪武九年（1376）。自小被视为神童，五岁读书就可以划分句读，十岁就已经把“五经”熟记于心。成年以后，更是勤学不辍。在政治上，他先后做过县学训导、济宁知府等官职，是明朝初年的名臣。在济宁为官时，他为了能够使下言得以上听，张榜公告，只要百姓有不平之事，都可以到官府来说，任何下级官吏不得盘查诘问。另外，他还经常找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来咨询自己治理当地的得失。这样的结果就是，当地的官吏不敢结党营私，而欺压百姓的事也就很少出现了。由于他勤政为民，体恤百姓，当地的户口在他任内的三年多时间里从三万多户翻了一倍，而税收更是从一万多石增加到十四万多石。所以，宋濂在《故愚庵先生方公墓铭文》中称赞他：当地家有余粟，野无饿殍，牛羊鸡犬散于郊野的景象都是源于他的这种宽仁爱民的行为。

同时，方克勤也非常重视文教的作用。他注意到当地的郡学官员缺失，甚至孔子的庙堂也颓败不堪，于是延聘前进士为郡学的教师，增补学员。同时，令一些僧人来修葺庙堂，造场圃，改善生员的学习环境。他还亲自为生员纠正句读，判断正确与否。

由于方克勤治民有术，明太祖朱元璋多次予以奖谕。而且说：当你的政策取得成功之后，我当会重用于你。除了精于治民之外，方克勤也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官员。就在朱元璋勉励他的这一年八月，在方克勤的治下，有一个叫程贡的低级官吏，

曾经因为不称职而受过笞刑，一直对方克勤怀恨在心。于是秘密上书皇帝，诬蔑、攻击方克勤。朱元璋诏命御史杨某督察此事。杨是程贡的朋友，唯恐程贡阴谋不成反倒落下诬陷大臣的罪名，于是，他到了当地，脱下官袍换上民服暗自搜集方克勤往昔的一切过错。可是过了两个月，仍然一无所得。在万般无奈之下，这个御史只有将官府中大小卒吏全都抓了起来，施以严刑拷问，希望通过屈打成招的办法获得一些“罪证”，结果却让他更加失望。最后，他们只有诬陷方克勤使用了官仓中的灰苇。这本是冬季取暖之物，而当时才10月间，天气未冷，所以并不可能使用。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方克勤自知是诬陷，但也并不辩解。为不连累百姓和下属，他从容赴京师担当。这件事激起了当地的民愤，为其鸣不平的百姓站满了街道，甚至随行车驾百余里。而方孝孺作为方克勤的次子，也曾上书，表示希望以身从军代赎父过。

虽然方克勤在不久之后便病逝于京师，但他却以身作则向方孝孺展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为人之道、为官之道。在《故愚庵先生方公墓铭文》中，随处可以看到类似的记载。比如他在动容周旋之间必合礼法，奉养简素，不穿纨绮之衣。甚至在写文章的时候，也表现出不重文采、质而不华、平和明理的风格。而方克勤的这些廉而守礼、文以载道的为人为学的风范在方孝孺的身上也都或隐或显地体现了出来。

方孝孺生身母亲姓林名姬，在孝孺七岁时撒手人寰，留下二子。孝孺排行第二，上有兄孝闻。

方孝闻，字希学，生于元至正十一年（1351），卒于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终年46岁，与孝孺享年相同。力学笃行，平日里始终以书为伴，功底扎实，“遍学五经，而邃于易，

精求圣贤旨趣，由致知而诚身，由亲睦而爱物”。孝孺受其影响并得益不少。他说：“某所以粗知斯道者，非特父师之教，抑亦吾兄之训饬也。”每每遇到疑惑处，即求教于其父其兄。孝闻同时也是儒雅孝顺的榜样。母亲病故之时，他“蔬食种制”，“人以纯孝称之”。兄弟二人感情笃深，但兄先孝孺而死，闻兄病逝，孝孺悲痛欲绝，数日未进饮食。但远在汉中，未能在弥留之际送兄，孝孺引以为终生憾事！

孝孺弟孝友，字希贤，为克勤侧室董夫人所生。建文四年（1402），与孝孺一起在南京聚宝门外被杀。

继母王氏，名在。林夫人去世后不久嫁入方家，贤惠而慈爱。待孝闻、孝孺犹如己出。对年幼的孝孺关怀呵护备至。但不幸的是，王夫人生一女后，未等满月，亦撒手归西。

七年之后，方孝孺的父亲也去世了。多年之后方孝孺回顾自己当年的经历时也是哀伤莫名。《逊志斋集》说：“盖三十而丁三，艰质素薄，苦多病重之，以悲哀割心摧腑，殆不能人。”说他不到30岁而经历了三位亲人的去世，加之自身体弱多病，重重悲哀恍如刀斧一般摧割肝肠。

三、早慧而扎实的童年

元朝末年，统治者对百姓的压迫和管制太过严苛与恶劣。当时不管哪一家人结婚，新婚之夜新娘子必须由元人占有，名曰初夜权；又怕汉人反抗，每十户人家才准许用一把菜刀，而且还用铁链锁在屋柱或井台上。加上当时灾害多，民不聊生。所以浙东民谣有“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的句子。

元末社会吏治腐败，官员贪污现象极为严重，且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如下官初次参见长官要收见面钱，逢年过节要收追节钱，适逢生辰要收生日钱，管事索要为常例钱，另“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甚至无事也白要叫撒花钱。真是惘然不知廉耻为何物。

元末大乱，是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代。北方有红巾军与元军激战；南方除了方国珍部外，还有各地此起彼伏的农民军和小股的反元力量也在四处活动。这种动荡的社会现实也影响到了宁海，渔民相聚生变，江浙行中书檄吴江同知金刚奴招募水兵试图予以剿灭。此时方克勤找到金刚奴，对他说人民是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才去做盗贼的；那些尚未加入盗贼的人还有很多，他们也早已蠢蠢欲动。在这种情势之下，为什么还要再给他们兵器呢。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简直不是在抵御盗贼而是在增加盗贼。但金刚奴没有听信方克勤的劝诫。结果正如方克勤预料的一样，那些新招募来的水兵在半路就杀了护吏，结伴投奔浮海反元的方国珍去了。而金刚奴则侥幸跳墙逃过一劫，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也跌断了一条腿。直至此时，金刚奴才后悔当时没有听从方克勤之言而遭受此等祸患。过了不久，朝廷又派侍御史左答纳失里来招抚义军，命浙江行省都事刘基副之。此时方克勤再次上书阐述剿灭义军之方略。都事刘基虽然很欣赏他的建议，但并没有采纳。关于此事的原因各家的看法莫衷一是。有的人认为刘基虽然赞同，但是最终的决定权仍掌握在侍御史的手中，所以没有最终付诸实践。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刘基深谙元朝早已腐朽不堪，难以辅弼，遂以全身远害为务。

结果在不久之后，台州、宁海等地均为义军所占领。而方克勤也因为终不见用，有智不获聘，愤而退居山中，以采松柏为食。此后尽管也有台州当地官吏再欲延请他出山为幕僚，也都被谢绝了。显然方克勤对昏聩的元朝统治者已经有了极为清醒的认识。

方孝孺生于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杰出的天赋。根据《逊志斋集》中的《方孝孺先生年谱》记载，他三岁识数，五岁为诗。六岁时写的诗就已经颇为可观，如《题山水隐者》：“栋宇参差逼翠微，路通犹恐世人知。等闲识得东风面，卧看白云初起时。”虽然在言词运用方面尚显稚嫩，且模仿前人王维的痕迹也较明显，但好在意境圆融，已得隐逸之意趣，实在难能可贵。

方孝孺在六七岁时即已有向学之心，但凡在书籍典册中见到圣贤的名字或杰出将相的样貌，便用小纸片记下来，极尽渴慕之情。这种目标的确立，更增加了方孝孺学习的动力。他九岁的时候就已经能背诵五经，较之其父，更早一年。而方孝孺并未松懈下来，在整个青年时期，他一直严格要求自己每天读书的厚度必须满一寸，从不违反。而且在读书的过程中极为投入，如他在《答俞子严》中说自己在十余岁的时候，每天都坐在书房中读书，碰到会心之处，即使门外钟鼓齐鸣、风雨大作也觉察不到。正所谓博观约取，厚积薄发。方孝孺写出的文章不仅雄壮豪迈，纯厚深远，而且写的速度极快，可以做到“千言立就”。

方孝孺对自己的期许也很高，常以历史上最为杰出的人物伊尹、周公自许，以辅弼君王建不世之功为志向，即使是管仲、萧何之辈也不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周公、孔子和自己一

样，是可以取法为师的，而颜回、孟子和自己也无不同，是可以做朋友的。这种语言简直是惊世骇俗，大家都把方孝孺看做一个狂人。更可笑的是，一些没有见过方孝孺相貌的人甚至还想专门来看看，这个人是否真的长得和古人一样。不管他人如何，方孝孺却不认为自附孔孟是狂妄无知，内心依然坚定。当他听说有人跑来看自己是否貌似古人后，笑着说，自己虽然外形相貌与当今之人无任何不同，但是内心却和古人相似。人们对此不解，方孝孺就向大家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说。在他看来：大家口中吃的是和周公、孔子、颜回、孟子一样的粟米；身上穿的是和周公、孔子、颜回、孟子一样的衣帛；在寒冷的时候生火，在暑热的时候吹风；建庐而居，驾车而行，昼起而夜寝。大家都是有目能视，有耳能听，有手可持物，有足可行路。为什么独独对于道却有这么多的顾虑呢？为什么后人就一定要亦步亦趋地跟在圣人的后面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不能如圣人一般有所创见呢？这种观点与韩愈在《原毁》中的一段论述颇为相似。韩愈文中提到的“古之君子”以舜和周公作为榜样，认为自己与舜和周公无有不同，且以不及舜和周公为耻。所以，同乡之人把年轻的方孝孺称为“小韩子”，即视为韩愈再生，那也就是自然之事了。

明洪武三年（1370），天下初定的朱元璋决定大兴文治。遂诏告天下，令各府、州、县皆立学，并设置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等学官。当时隐居天台山麓的方克勤因为才学出众，声名传遍乡里而被委任为县训导。一时之间身负书籍远来从学的士子达到上百人，当时年方13岁的方孝孺也跟随父亲学习。方克勤的讲授方法很独特，以经义为基础，广征博引贯通文义。这种教学方法效果非常好，不仅对于学生学问的提高很有

帮助，同时也对他们学习做人之道很有裨益。如《故愚庵先生方公墓铭文》中所说，所有听课人的受益沦肌浹髓，宛如香泽袭身迁为良善。这种教学方法对后来孝孺的从教生涯影响至远至大。二十多年后，孝孺到汉中作府学教授和蜀王世子的老师，都继承了父亲授课的传统，影响还超过了父亲。

四、勤奋自律的青少年时代

洪武三年年初，方克勤因为母亲年事已高需要服侍，坚决辞去县训导之职，临别之际学生们追随其后者以踵相接，甚至学舍也为之一空。也就在这一年，方孝孺陪同父亲回到了缙城里。

在读书的同时，方孝孺也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写作训练。在14岁的方孝孺身上已经多少表现出了一些思想家的特质。这一年，方孝孺创作了大量规箴性质的作品来砥砺自己的德行。具有代表性的是《幼仪杂箴》20首和《杂铭》45篇。在这些箴言里，方孝孺表现出了鲜明的儒家学养特质。无论是行跪拜揖、饮食言动的举止，还是喜怒好恶、忧乐取予的法度，一切都要有所约束，不可忽视。方孝孺认为，要真正成德，一定要内有所养而外有所约。这样才可以庶几及之。

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年轻的方孝孺对自己的要求是多么地详悉而完备。甚至涉及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所不包。如《坐》要直背端貌，不可踞坐倚侧，宜如山之恒德；《行》要步子稳实，容貌舒坦，不紧不慢，行仁义之途；《寝》则宁心静气不妄思，睡姿既不可偃伏又不可仰尸；《言》则尤其需要谨慎，因为发于口为好坏褒贬之别，入乎人耳则为喜怒

之分，用于人世，可成可败，传于书籍，为贤为愚，一言以蔽之，慎言是也；《食》则求俭，与其愧受珍贵膏腴之馐，不及野蔬藜藿之甘，与其尸位而享万钟之粟，远不如以有为而受釜盎之餐；《酒》有节制，不可贪杯失礼，妨碍家国之事。冠要正，带合身，穿衣如修德。笔不妄动，墨当爱惜，砚也盛存乾坤，纸用以立言载道，行仁义，以利其民。

如爱好，方孝孺在《好箴》中讲，对于一般外物，即使足有可爱之处，也不应该沉溺于此，而如果是道德中有足以令人欣喜之品质，则一定要效法它。因为如果一个人以外物为鉴，以品德为贵，则不会有人说他距离“道”仍然很远。

又如取得，方孝孺在《取箴》中提出，如果是通过不义的途径得到的东西，那么即使如锱铢也不放在眼里。而如果通过义的途径得到千驷之巨也问心无愧。无论外物是多是少，只要不符合义的道理，就像并不存在一般。

这不仅会让人想起《论语》中孔子说的那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其实这种奉养简素、非义不取的品质，在他父亲方克勤身上也可以看到。比如其父平生不穿纨绮之衣，常年着一布袍，甚至数载不易。每天只吃一次肉，而如果当天并不办理官府公事，则一天也不会吃一次肉。因为他为人极为廉洁，所以每次外出办公的时候，一切应用之具皆随身携带，在当地甚至一杯热水都不肯喝。一次，兖州的官员派一个小童送两个水瓜给方克勤。方克勤觉得这样做有行贿之嫌疑，所以鞭笞了小童，然后把水瓜归还了去。

除了《杂箴》之外，方孝孺还写了一系列的《杂铭》。这些铭文托物言志，其中一些思想也颇为可观。

如在《纸铭》中，他将纸的功能和自己的抱负熔铸于一

炉，说纸用以立言载道，行仁义，以利其民。意思是，如果用纸来写文章，是希望它可以“载道”。如果用它来记载事件，则希望它可以有利于人民。如果用它来实施教学，则希望它可以传播“义”。用它来立法，则希望它可以体现仁政。

又如在《席铭》这一篇中，方孝孺以坐卧之席阐发开来，认为过于舒适安闲，则容易让人沉溺于其中；而溺于安逸之祸，较之洪水猛兽不遑多让。而相比较而言，一个人如果仅仅是身体沉溺于水中，旁人尚可下水救之；假若此人是心溺，又有谁能救得了他呢？宁可忧伤与谨慎。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等等，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另如《衾铭》一篇，从中可看出方孝孺忧民的杰出之处。在此篇中，他提出一个人在自己温暖的时候要想到别人所受之寒，而当自己安逸的时候，要多想到别人的艰难。“己之暖，思人之寒；己之安，思人之艰。”此铭似与广为传诵的司马光的《布衾铭》颇有些关系。

在《炉铭》中，方孝孺表达了对于人民之力的重视。他以炉取譬，指出如果你靠近炉子，则它可以温暖你。如果你过于狎戏而触碰它，则它会烧到你。人民就像这炉中之火，不要以为可以随意侮辱。这种民本思想在我国古代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从《孟子·尽心下》的“民为贵，社稷次之而君为轻”，到《三国志》中的“国之有民，犹水之有舟”，再到《孔子家语》中的“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等论述即可以看出。但难能可贵的是年仅14岁的方孝孺竟然也有此意识，并形诸笔端以为劝诫，足见他对于此问题的理解是有一定深度的。

洪武四年（1371），方孝孺随父到济宁知府任的那一年，